

齐文化论稿

王志民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得以扭转。春秋时，则九诸侯，北逐狄戎，南拒强一匡天下，恒为霸主。战之世，则始终强为七雄之齐威早称王，齐闵首称帝。大半时间左右着战国时局发展。大体说来，齐立国

弱的状况，不能不说是一史的奇迹。细细考究，齐国有因，其兴国有术。除发展经济之外，继承和弘了姜太公人才立国的传统，举贤不尚功多山绩，靠立业，靠

95
K225.03
5
2

齐文化论稿

王志民

山东大学出版社



C

227770

鲁新登字 09 号

责任编辑 保 成
封面设计 张 越

齐文化论稿

王志民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电子工业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大 32 印张 8 208 千字
1995 年 4 月第 1 版 199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607-1438-2/G · 144

定价:6.60 元

序

董治安

八十年代以来，以齐故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为中心开展起来的齐文化讨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注目；一批批论文和专著的发表，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也预示着这个方面的研究很可能还将进一步有所拓展，并深入下去。

这里所说的齐文化，主要是指先秦时代齐国的历史文化。齐国住居华北平原东端，地处海岱之间，北临于燕，南接于鲁。齐文化与燕文化、鲁文化之间，虽不无相通之点，总体看却存在很大的差异。齐文化是我国古代具有鲜明特征和相对独立意义的一个区域文化系统。

齐国是我国古代经济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太公吕尚在建国之初，就注重“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春秋之际，姜齐进一步“通轻重之权，缀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更加推动了生产的开发和工商业全面地走向繁荣。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的霸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元前四世纪前后，齐都富庶繁华、人口密集，规模之大为各诸侯国之冠；有力地促进了强齐与远近诸邦的物资交流和政治往来。今存《管子》等书中所见之经济思想的丰富、深刻，令人惊叹；其理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的最高水平。

齐国有“尊贤上功”的传统，与邹鲁诸国奉行“亲亲上恩”的修政方针和用人原则迥乎不同。开国者太公吕尚“多兵权奇谋”，

一生军功赫赫、政绩卓著，本身就是齐国发展史上的一面大旗。桓公为显功固霸不计私怨而重用管仲（《史记·管晏列传》），田齐威王纳邹忌之谏广开言路（《战国策·齐策》），威、宣二世“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都是千载传诵的佳话，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齐国先后产生过一批彪炳史册的政治家、军事家，其积极的开拓精神，丰富的实践经验，精深的谋略和巧妙的智慧，一直为后人所敬重。齐国军事人才和军事著作数量之多、水平之高，尤非其它诸侯国所能望其项背。著名的《孙子兵法》至今仍被视为古代军事科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齐国重视与各诸侯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战国时代更是诸子百家争鸣的中心。春秋末期，孔子曾在齐与齐太师语乐（见《史记·孔子世家》），墨家创始人墨翟，大约在战国初年也曾不止一次到过齐地（参见《墨子》之《耕柱》、《贵义》、《公输》等篇）。田齐执政者设“稷下学宫”，聚天下贤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各著书言治乱之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前后百余年，盛极一时。道、法、儒、墨、名、阴阳各家众多学者，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等，都曾来稷下游学；其中大思想家政治家荀子留齐时间竟长达数十年之久。齐国学术思想活跃、丰富，风格博大恢弘，而在内容上、形式上则带有一定包容性和综括性的特征。这在《管子》、《晏子春秋》以及其它出自“稷下先生”的许多论著中，都有具体的体现。

显然，齐文化不仅是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重要区域文化之一，而且产生较早，内涵丰富，富于活力，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进一步开展齐文化的研究，发掘精华，总结规律，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志民同志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齐文化的研究，积极参加了

有关稷下学宫、管子和齐文化的一系列学术讨论；在主持完成省“七五”规划重点项目《齐文化概论》和参与主持《齐文化丛书》的编纂工作以外，还发表了四十多篇有关齐文化的学术论文。这本《齐文化论稿》，就是在长期钻研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

本书对于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历史文化给予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述，并且注意了前后源流的辨析，大有助于读者对齐文化的全面把握和综括了解；在写法上，力图把一般史实的评价同若干专题的深入探讨结合起来，从而自然形成了全书的学术取向和讨论重点。本书应该说既有某种普及性又有相当的研究深度，并且是一部反映着作者本人特定兴趣与追求的学术专著。其于齐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促进作用。

王志民同志对于齐国历史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十几年来，一面承担着大量教学任务和行政工作，一面以很大的毅力潜心钻研，锲而不舍，不断有新的学术成果问世，令人钦佩！这本专著的出版，表现了他在齐文化研究中最近的开拓进取，也标志着他在学术攀登上又有了一个新的起点。预祝志民同志的齐文化研究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

董治安 于山东大学南园

一九九五年二月

目 录

序	董治安 (1)
第一章 综论	(1)
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齐文化	(1)
二、光辉璀灿的历史文化明珠——临淄	(9)
三、齐文化渊源略说	(15)
四、齐文化观念特质与民主精神	(18)
第二章 齐国论	(25)
一、齐立国论	(25)
二、齐兴国论	(34)
三、齐亡国论	(43)
第三章 人物论	(55)
一、姜太公考略	(55)
二、齐桓公霸业论	(61)
三、晏子与《晏子春秋》	(70)
四、晏婴其人与其业	(73)
五、绵里藏针——晏婴性格论	(79)
六、晏婴的美学思想	(91)
七、稷下辩智——田骈	(99)
第四章 稷下论	(103)
一、稷下学宫概论	(103)
二、稷下学宫的地理位置	(112)
三、稷下学宫的政治性质	(114)

四、稷下学宫的文化特点·····	(117)
五、稷下学宫的历史作用·····	(127)
六、稷下学宫的文化贡献·····	(131)
七、稷下学宫与春秋战国的尊师风尚·····	(136)
八、稷下先生的集体创作——《晏子春秋》·····	(146)
九、稷下学宫杂考三题·····	(157)
第五章 《齐风》论 ·····	(164)
一、《齐风》的创作年代·····	(164)
二、《齐风》与齐俗·····	(167)
三、《齐风》与齐礼·····	(173)
四、《齐风》与齐乐·····	(180)
五、从其流，溯其源·····	(186)
第六章 杂论 ·····	(190)
一、孔子与齐文化·····	(190)
二、秦始皇与齐文化·····	(201)
三、汉赋与齐文化·····	(212)
四、齐国音乐艺术略论·····	(222)
附录：	
我的治学之路 ·····	(232)
后记 ·····	(244)

第一章 综 论

一、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齐文化

论及地域文化，常有“齐鲁文化”或“燕齐文化”之称。但实际考究起来，齐文化并不同于鲁、燕，它是独具特色的。

严格说，齐文化是以先秦时期齐国的历史、地域为中心的古代地方文化。在地域范围上，它随齐国疆域的变化而变化，最大时，以齐都临淄（今属淄博市）为中心，南至泰沂山区，北到渤海平原，西依黄河古道，东括山东半岛，包括了今胶东、鲁中、鲁北地区和鲁西的大部，占今山东省的三分之二。从历史年代讲，齐文化从周初太公望封齐开始，经齐桓称霸，田氏代齐，稷下争鸣，而达于鼎盛。下及秦汉，由于先秦文化的影响，各地域文化仍很活跃，而齐学尤为特出，蔚为汉初“显学”。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定于一尊，习经之风，广被各地，齐文化也渐融于文化一统之中。齐文化以其流风余韵，泽及后世，但作为集中的文化表现，则是终汉而止的。

齐文化曾以鲜明的地方特点，抒写了中国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那么，其特色何在呢？

（一）特殊的建构基础

齐文化建构于独特的土著文化——东夷文化基础之上。

东夷，是我国东方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它分布很广，山

东一带是其主要活动地域，而齐、鲁两地，则是东夷族的两个活动中心，鲁地曲阜为东夷始祖“少昊之墟”，齐地临淄（营丘）是少昊的司寇爽鸠氏的封地。对于山东地区的史前文化，夏鼐先生曾有过精辟论述，他认为从北辛庄→大汶口→龙山→东岳石，“自有其演化的序列，与中原地区的和长江下游地区的各不相同。”（《中国文明的起源》98—99页）这自成系统、独具风格特点的史前文化，就是山东的土著居民东夷人自己辛勤劳动创造的、土生土长的东夷文化。

东夷文化发展情况如何？文献记载很少。我们从“桀为暴虐，诸夷内叛，殷汤革命，伐而定之”（《后汉书·东夷列传》）的记载中，知夏商之交，东夷部族已很兴盛，从“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知道在商末，东夷势力十分强大，曾对商政权的存亡构成直接威胁。从一些其他的资料中知道，东夷与夏、商政权是杂间而处，时相离合，停停打打的。

近年来，山东地区考古的丰硕成果，充分显示出至少从大汶口文化到西周以前这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东夷文化已发展到很高的程度。这里仅举两点：大汶口10号墓中随葬品多达160余件，数量之多、品类之丰、造型之美为其他地区大汶口文化所少见；从齐国腹地潍、淄水流域出土的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精美、玲珑、优雅，器形多变。亦为各地龙山文化所罕见。因而有人认为：“东夷族人是一个有着光辉灿烂史前文化的民族。”（《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31页）不过也应看到，东夷是一个由多个部族组成的民族，其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总体讲，东夷文化应是与中原文化齐头并进，同步发展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渊源。

周定天下，数伐东夷，昔日强大的夷人被驱于半岛之一隅，太公、周公分封于齐、鲁。这标志着周民族对东夷族的征服，也象征着东夷文化向周文化的转化。然而，东夷文化之能成为齐文化的建构基础，关键在于太公望封齐以后的政策。《史记·齐太公世

家》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这说明，太公建构齐文化，一方面因夷俗、简夷礼，在意识领域保留了东夷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通商工、便鱼盐，在经济文化上也保留了东夷滨海文化的特点。这同周文化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特点，同伯禽到鲁后，通过“变其俗，革其礼”（《史记·鲁周公世家》）而使鲁国成为较单一农耕经济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尤值一提的是，太公所做，成为齐国历代统治者的一贯文化政策。十四世后，管仲相齐，仍采取“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的方针（《史记·管晏列传》）。这样，东夷文化就能最大限度保留在齐文化之中，成为其建构的基本因子，齐、鲁皆承东夷，而特色迥异，盖源于此；齐文化诸多独异于其他地域的文化表现，也与此有直接的关系。尽管限于史料和篇幅，我们不能一一比列东夷文化在齐文化中的种种再现，但是，齐文化所表现出的滨海文化的特色，分明体现着东夷文化的特点。

当然，文化的建构是多元的。齐为周朝封国，姜姓与周之姬姓又本为一对世传婚姻的胞族，所谓“昔少典娶于有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国语·晋语》）姜炎文化、周文化也应是齐文化的基本建构成份。又先齐之时，齐地本为夷商杂居之处。从齐国在西周春秋时期的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及大量地杀殉人畜、妇女地位较高、巫术风气较浓等方面看，其商文化色彩也较浓厚。应该说，周文化、商文化、姜炎文化、东夷文化是齐文化的四大渊源，而东夷文化是基础。

（二）鲜明的文化特色

齐文化从多个方面表现出它不同于其他地域文化的特色，例如，社会风尚的尚功利，“尊勤劳”、喜“奢侈，好末技，不田作”（《汉书·循吏传》）。齐人性格特点的“贪粗而好勇”（《管

子·水地》）、“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怯于众斗，勇于持刺”（《史记·货殖列传》）。在婚姻习俗上，宗法观念淡薄，同姓相婚及女子多有“至老不嫁，以养父母”者（《战国策·齐策》）等。但综合归纳，最主要的是：经济上的农商并重；政治上的尊贤尚功；学术上的兼容并包。其文化的特质是主变而恶常。

齐国虽依山傍海，但太公初封齐时，经济基础并不好。《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盐铁论·轻重篇》都记载了当时齐地负海泻卤，地薄人少的情况。太公因地制宜，随事而化，采取“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劝女功“极技巧”、“宜桑麻”等经济政策，这是农商并重，五业俱兴，全面发展的方针。至齐桓称霸，管仲相齐，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条政策，不仅“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好恶，因时而宜”，而且将士农工商，皆列“国之石民”（《管子·小匡》）予以同等重视，并将全国分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勿使杂处”，从国家组织形式上为农商并重提供了保证。田氏代齐后，为谋求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农商并举继续得到发展。宣王时，临淄已成为“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浑沔成雨，家敦而富”，人口数十万的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纵观春秋、战国数百年，齐国始终以国富民强名世，以偏居海之一隅，而鼎足秦、楚，图霸称帝，多赖于此农商并重之策，它体现了齐在经济文化上的因地制宜，随时而化，不守陈规，力求发展的主变特点。

齐国政治上的“尊贤尚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计出身，唯才是举；二是以功为尚，不重名分。这固然与齐之始祖太公本身出身低微有关，但作为国家政治的传统政策，则与齐国的文化土壤和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密不可分。《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周公封鲁，也把“尊尊而亲亲，”作为治鲁方针。唯独太公实行举贤而上功的政策。这在周初是很了

不起的。此后，即以此为继。齐国历史上，两位功业显赫的贤相，“管仲以其君霸，晏婴以其君显”，前者为“鄙人之贾”（《战国策·秦策五》）是个小商人；后者有所谓“东夷之子”之称（《孔子家语·曲礼》），亦非齐之贵族，但二人都身相齐国，各显诸侯。他如鲍叔、宁戚等亦皆出身低微。景公时，晏婴荐御者为大夫、司马穰苴为将军，举越石父于縲绁之中，都是举贤不避出身的实例。这在世卿世禄制度的时代，是很开放、高明的政策。战国时期礼贤下士成为一时风气，而齐国的尊贤尚功也推向极致。齐威王时重用三人：内相邹忌，本为布衣之士；外将孙臧，为刑余之人；上卿淳于髡，则是一出身低贱的赘婿。齐宣王时，将稷下学者邹衍等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国的事业几乎可以说是由代代承传的平民（或下层出身）的政治家干出来的，这不是哪一个国君的权宜之计或头脑发热，而是文化传统使然。这一点在齐人的观念中也有显著的表现。齐人提及先人多念其功，宣王见孟子，独问齐桓晋文之事，即慕其功业（《孟子·梁惠王上》）；齐人公孙丑问孟子“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回答“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可见齐人追慕管、晏，重在其功。这与孔子的“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的感恩观念是有明显区别的。

齐文化的特色，在学术上的突出表现是兼容并包，是其多变性、接受性和融合再生性。太公初治齐，实行“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汉书·地理志》）以及“因其俗，简其礼”的方针，与老子的道家思想颇为相近；管仲辅霸，提倡富国强兵，任霸用法，为后代法家之先导；晏婴相齐，则力倡节俭，任贤爱民，省刑隆礼，儒、墨思想得兼。都表现了“与时变、与俗化”的多变性。战国之世，经稷下争鸣，各种思想纷纷登上齐国的文化舞台，全面呈现出兼容并包的特色，齐国学术思想的接受效应明显地表现出

来，田齐尚法，但它却接受道家的学说，主张“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管子·法法》）实际以道家思想作为法家的理论基础，道法并提。同时，又强调法制与礼义教化并举，包容进儒家的学说，与秦法家“以刑去刑”、“以法为教”等思想有显著差别。又如，齐之道家，一反老、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等排斥儒家思想的观点，以老子的“无为”、道德学说为基础，吸取儒家的仁、礼思想和“以名稽实、以法定治乱”等的法家思想，兼采众家，形成了道家的支派——黄老之学。另外，先秦时期阴阳家和五行家的思想也在稷下交汇融合，并经邹衍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独立的体系。人们常用“百家争鸣”来形容先秦学术交汇的盛况，实际上，这也正是对齐文化兼容并包特点的高度概括。

（三）独特的历史贡献

首先是对先秦文化的贡献。先秦是中国文化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先秦文化的飞跃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时期的社会土壤的催化。一是春秋时期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一是战国时期的礼贤下士和“百家争鸣”。春秋时，齐桓首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实际成为当时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齐文化以其强烈的包容性和辐射力，影响了整个时代，对春秋文化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为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战国时期，自威王立稷下学宫，设大夫之号，临淄又成为学术文化的中心。齐文化从以下三个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一，把礼贤下士之风推向了极致。他们在稷下“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史记·孟荀列传》）以极优厚的待遇吸引各国学者，多至“数百千人，”蔚为大观。其二，稷下创立，各派学者率徒而至，多者如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皆期会稷下，聚徒讲学。这样，既繁荣了私学，推动了教育，又培养了大批文化学术的有生力量。其三，齐文化在战国时期的发展，

代表了文化上趋向统一的大势。稷下学宫，不仅是争鸣中心，也为各派思想的融合、统一提供了适宜的场所。是千流交汇的入海口，为秦汉以后民族文化的统一作了准备。

其次，齐文化的繁荣与鲁文化共同形成了齐鲁高文化区。齐鲁，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有“为学慕齐鲁”之誉（苏辙诗）这与齐文化的贡献密不可分。先秦时期，齐为文化中心，人才之盛自不必说，两汉时期，仍以此著称。西汉一朝，五经八师中的四个：《诗》之辕固生，《易》之田何，《尚书》之伏生，《公羊春秋》之胡毋生，皆为齐人。足见齐学影响之大。东汉时期，仅青州一带，即出硕学大儒、茂林文士 19 位。而齐地之北海国一带，文人著书多达 65 种。其地私学也极发达，收徒千百人的大师有 8 位，门徒几遍天下的鸿儒郑玄即为北海人。齐文化影响之巨，远被数代。

第三，齐文化对秦汉政治、学术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一是齐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为秦汉最高统治者建立新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因而受到欢迎、重视，被用作制定政策的依据。《史记·封禅书》载：“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又记：“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秦亡汉兴，阴阳五行学说同样作了理论上的解说：“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黄。”（《史记·封禅书》）

二是齐国的神仙方士之学对秦汉政治影响极大。秦始皇统一后，醉心封禅、访仙、神祀、求不死之药。许多重大行动都与神仙方士有关。他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显受齐地自太公以来行八神之祀的影响；就是震慑千古的“焚书坑儒”之举，

虽导火于齐人淳于越“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的儒家说教，其实质则是因受方士的欺骗而对书生产生的反感作怪；而秦始皇最后亦死在游山觅海求不死之药的途中。

汉代统治者也极迷信神仙方士，尤以汉武帝为甚。他不仅相信齐方士李少君之诡言“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之属”，而且拜“以鬼神见上”的齐方士李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拜齐方士栾大为五利将军，佩四将军印，封侯赐第，“贵震天下”。致使“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均见《封禅书》）蔚为一代风气。

三是对秦汉政治影响极大的博士制度，也来源于齐文化的传统。许慎《五经异义》记：“战国时，齐置博士官。”稷下先生淳于髡也被称为博士（见《说苑·尊贤》）虽然博士之称也见于战国鲁、魏、秦诸国，但秦汉博士之称与稷下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例如，博士叔孙通又被称为“稷嗣君”，言其“嗣风于稷下”。博士孔安国被弟子郑玄尊称为“棘下生”（稷下生）。也认为博士是产生于稷下的。秦汉的博士，一官数职，议政、制礼、藏书、教授、试策、出使等，与齐稷下先生的职分基本相同，也可视为有承继的关系。足见齐文化与博士制度的密切关系。

另外，齐之黄老之学为汉初的统治思想，方家多有所论，此不赘述。

第四，齐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主要是以改头换面的形式，融入其中，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首先，传统儒学与齐文化有极深的渊源关系。儒学由孔子首创，孔子倡仁，但“仁”的思想却并非发端孔子。孔子祖述尧舜，舜，“东夷之人也”（《孟子·离娄下》）。《说文·羊部》“夷俗仁”。《韩非子·难一》：“舜其信仁乎！”《汉书·地理志》：“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惮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这都说明先齐的东夷文化是崇仁的。孔子学说，在三方之外行不通，即欲居九夷，反映了他对东夷“仁”的世界的向往和赞赏。这至

少说明先齐文化与孔子儒学的渊源关系。其实，“因其俗，简其礼”后的齐文化，也保留了仁的思想，《齐风·卢令》：“卢令令，其人美且仁。”这都在孔子之前。虽然证据尚嫌不足，但齐文化与孔子儒学的关系，应该是有一定渊源的。儒学发展到董仲舒，是经过了一番伤筋动骨的改造，以“新儒学”的面目，成为传统儒学基石的。而董仲舒主要是以齐学的阴阳五行对儒学进行改造的。《汉书·五行志》：“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可见，是儒家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的全面结合。

其次，齐文化的黄老之学，阴阳五行、神仙方士之学相结合，成为中国道教最主要的来源之一。黄老思想中那些鼓吹以清静无为治天下及神秘主义的因素，神仙方士中对长生不老的追求和海中山的宣传，以及阴阳五行那些带有宗教色彩的解释，都为道教继承和吸取，在这方面，齐文化是以其思想融合体的形式直接为道教提供了丰厚基础的。

总之，齐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基础，鲜明的文化特征、特殊的历史贡献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和借鉴。

二、光辉璀璨的历史文化明珠——临淄

淄博，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也是一座名闻遐迩的历史文化名城。现今淄博市的临淄区，即是春秋战国时期泱泱东方大国——齐国的都城。走在这片素有地下博物馆之称的古老美丽的土地上，放眼望去，斑斑古城遗迹，记载着它昔日的繁华；座座王陵古墓，昭示着它辉煌过去。历史是这么有情，千年古都与新兴工业名城和谐共现，现代化与古老文明相映成辉。